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化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李 涛◎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李 涛◎著 |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化 / 李涛著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8.9
ISBN 978-7-112-22150-9

I. ①经… II. ①李… III. ①长江三角洲 — 城市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IV. ①F29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9481 号

责任编辑: 张 明

责任校对: 焦 乐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化

李 涛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科地亚盟排版公司制版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40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一版 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7-112-22150-9

(3199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是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中面临的新议题。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的前沿阵地,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全球城市一区域”,核心城市上海也是中国最具潜力能够成为“全球城市”的。可以说,长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见证,也是未来中国继续走向全球,参与国际竞争的代表。

2010 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的功能定位是:“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门户,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世界级大城市群,全国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基地,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辐射带动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我国人口集聚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同年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地区发展目标:“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4 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和 2015 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群被赋予了推进我国未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地位。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城市群更是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和竞争,发挥其对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长三角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交汇地,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典型的全球城市区域。这项战略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区域协调政策的制定。在这一背景下,本书旨在探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三角地区城市体系演化的特点和趋势,这对于深刻认识区域空间结构,制定相关区域政策,谋划城市发展战略都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作为中国典型的城市群,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阶段、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都明显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城市群,因此其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和演化有着显著的不同。本研究能够为相关理论提供更加多元的典型案例,拓展城市体系相关理论的内涵和研究方法。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资本体系视角下全球城市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及规划策略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51708123)”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赵渺希教授相关课题成果的后续研究。在此,特别感谢唐子来教授的悉心指导和教诲。同时,要感谢华南理工大学的王世福教授、赵渺希教授,华

东师范大学的孙斌栋教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熊鲁霞教授，同济大学的宋小冬教授、张尚武教授、孙施文教授，复旦大学的梁鸿教授、张伊娜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 涛

2018年2月9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前 言

第 1 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内容	32
第四节 研究的时空范围	33

第 2 章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空演化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44
第二节 外资依存度的时空演化	45
第三节 外贸依存度的时空演化	46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指数的时空演化	48
第五节 小结	51

第 3 章 基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全球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化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54
第二节 分支机构的时空演化	55
第三节 网络关联度的时空演化	59
第四节 网络腹地的时空演化	61
第五节 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	64
第六节 小结	66

第 4 章 基于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全球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化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70
第二节 分支机构的时空演化	71
第三节 网络关联度的时空演化	79
第四节 网络腹地的时空演化	81
第五节 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	83
第六节 小结	86

第 5 章 区域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化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90
第二节 网络关联度的时空演化	91
第三节 网络腹地的时空演化	98
第四节 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	109
第五节 网络层次的时空演化	113
第六节 小结	119

第 6 章 区域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24
第二节 地级或以上城市空间单元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	126
第三节 区市县空间单元产业价值区段的时空演化	132
第四节 小结	137

第 7 章 经济全球化新进程对城市体系演化的作用机制

第一节 引言	140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新进程与地区竞争力六要素的耦合分析	141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新进程与区域城市体系演化的关联检验	153
第四节 小结	156

第 8 章 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的价值链案例

第一节 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价值链与地方发展条件的耦合	160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网络分析	162
第三节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网络分析	167
第四节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网络分析	175
第五节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价值链网络分析	183
第六节 小结	190

参考文献	193
------------	-----

第1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象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对外贸易、外来直接投资、资本流动、人口迁移和技术扩散的发生,使得各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各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出现经济此消彼长的格局,进而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组织形态,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城市—区域”的出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国家和区域的城市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程度越来越高。卡斯特勒斯(M. Castells)认为,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流通空间(space of flow)而不是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造就了全球城市体系。这里,流通空间是指信息、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形成的全球经济网络,场所空间则是指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的枢纽(hubs)和节点(nodes);其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化,以“行业类型”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转变为以“价值区段”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唐子来,赵渺希,2010)。

始于2007年8月份的全球金融危机,自爆发后由虚拟经济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造成了严重影响,并通过国际贸易等形式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此次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至今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国际贸易摩擦和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全球经济分工产生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各国纷纷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全球再度进入“强政府干预时代”,政府行为对各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和城市体系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下,观察特定“全球城市—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也是国家和地方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议题。至2010年,中国吸收外资仅次于美国,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全球城市—区域”。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长三角地区也深受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要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面临巨大的发展挑战;另一方面,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强力政策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外部与内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因素驱动下,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演化将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

全球化一词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营销大师李维特(T. Levitt)于1983年提出,被解释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全球各地消费者对商品的品位认定逐渐趋同化,并为商品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全球市场。作为目前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全球化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外贸易、国外直接投资、人口迁移和技术扩散的发生使各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有些学者也将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德拉德赫萨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众多市场实行自由化、开放和国际整合的过程,涉及从劳动力到商品市场、从服务市场到资本和技术市场等广泛领域。

全球化进程一般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前全球化阶段(1750—1870年)、贸易全球化阶段(1870—1913年)、技术贸易全球化阶段(1914—1960年)和全球化第四阶段(自1960年至今)。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本的输入输出开始采取跨国合资甚至兼并收购的方式,使得跨国投资迅速增长。也有学者将1960年以后的阶段细分为生产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和服务的全球化,认为这四个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重叠,很难进行绝对清晰的划分(成思危,2001)。

2007年8月份,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动荡,开始向市场注入资金,表明官方承认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很快由虚拟经济传导到实体经济,逐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造成了严重影响。到2010年底,全球经济衰退虽然有所缓解,但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一) 金融危机的成因

关于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的解释,国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信贷管理的不尽职、监管无力和不到位、货币政策失误、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理论、美国政治右转导致平等与效率的失衡等。国内学者则大多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证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政治取向、霸权战略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等因素,或者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对抗性爆发等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2009年度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指出,自2007年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仅仅是本轮经济衰退的表层因素,其深层原因在于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已经进入衰退阶段:技术创新告别了“技术提高单位生产率”的快速发展期;全球化红利带来的资源再配

置效益、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效应难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价格和汇率重新洗牌的情况下无法支撑现有格局。本轮经济周期的转向对各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预示着美国依靠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能持续，原材料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也意味着亚洲过度储蓄并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经济全球化扩大了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一方面是因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经济全球化在美国次贷危机扩散为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证券化的影响，那些被创造出来的证券，被分销到世界各地，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其次，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通过金融和贸易等途径传染到其他国家。J. Pisani-Ferr 和 I. Santos 研究了危机由美国和欧洲扩散的传播途径发现，对资本进口国家（如中东欧国家），资本流动传导途径导致资本链突然中断，进而引起资本的高波动；对东亚国家，贸易是主要的传播途径，而且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学者认为，它标志着快速扩张的全球化的终结。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全球化、国民经济和跨国组织如何管理的思考。全球化的批评者始终认为，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收益，富人收益大于穷人收益。金融危机以及国家的应对措施开始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并使得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转移。学术界关于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讨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对跨国公司战略的影响和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

在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方面，全球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都出现明显下滑。2008 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 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金融危机中，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越南）而言，其出口型工业遭受严重打击。在此过程中，金融危机通过三种机制对国际直接投资（FDI）产生负面影响：银行信用紧缩导致公司融资困难，降低了其投资能力；资本缩水使得 FDI 重要来源的私募基金和国家财富基金无法继续参与跨国并购和产业投资；经济疲软和需求萎缩导致 FDI 的信心受挫。联合国的官方报告总结了全球 FDI 收缩的原因，首先是公司投资能力的下降（利润下滑、融资困难等原因），其次

是经济前景的黯淡，这两个因素均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意愿。即便到2010年世界FDI已开始出现缓慢复苏，当年的FDI总额（1.2万亿美元）仍未恢复到危机前平均水平（1.5万亿美元）。

全球金融危机对各行业的影响是有差异的。那些受经济周期影响明显的行业受影响最大，包括汽车、交通材料、建筑、电子电气设备和中间产品。受消费疲软的负面影响，石油和采掘业也受到拖累。那些受刚性需求影响明显的产业，公司情况明显较好，包括电信、制药和零售业。相对而言，商务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小。联合国报告显示，在2008—2009年，商务服务业的跨国并购数据降幅低于服务业的整体降幅。在这一阶段保持继续增加对外投资计划的跨国公司，包括部分制造业（医疗设备、交通设备、信息和通信技术、新能源和环保相关产业）、商务服务业（金融、工程技术、区域总部、外包服务等）和个人服务业（健康服务、驻家服务）。

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会因自身经营能力的差别，境遇大相径庭，例如壳牌、BP等公司都在危机后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即便在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中，一些公司仍然由于良好的经营抵御住了危机的冲击（例如电子产品制造商LG）。联合国报告指出，生命科学、食品、运输装备、商务服务、个人服务、信息与通信技术、能源、化学和环保行业将因其良好的前景，在危机后迎来FDI的青睐。

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1》发布的数据显示，危机后发达国家FDI比重明显缩水，美国、欧洲受影响尤为明显，日本受到影响相对较小。发展和转型经济体作为FDI流入国的吸引力在增大，其流入FDI占比重已超过全球FDI的50%。特别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经济体，以其快速增长的庞大市场、自由化产业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相对平稳地渡过危机。跨国公司也普遍表达出希望这些经济体能够继续保持增长的意愿。东南亚依旧是全球FDI热衷的区域，即便这一地区的FDI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下滑，依然高于危机前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发展和转型国家流出FDI占比重首次超过30%，而且大多投向发展中国家，显示了这些经济体作为国际投资来源的地位有所提升。

（三）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战略的影响

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以后，缩减资本项目支出、控制成本、更为稳妥的现金管理和裁员成为跨国公司普遍的短期应对之策。作为全球FDI的主体，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已修订其全球扩张计划。联合国调研数据显示，有4/5受访跨国公司表示，金融危机将对其全球投资计划产生影响，这在汽车、建筑、中间产品、金融和部分消费品行业表现尤为明显。但就中长期而言，跨国公

司并未放弃全球化经营的整体战略，而是在资源重组、布局调整和重心转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调整，表现为三个方面：市场寻求导向、制造业公司服务化和本土化步伐加快。

金融危机后，市场需求成为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本地市场正在成为决定城市发展乃至区域竞争力的主要动力。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更为强调市场寻求战略（即靠近规模市场，以更好地了解当地需求和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拥有庞大市场的国家就成为国际资本竞争的资源和本国优势。泰勒（2011）曾撰文强调中国市场可以发挥全球化进程中消费主义的优势，这在金融危机后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资源和效率寻求型（通过追求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来提高竞争力，例如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 FDI 出现再布局的行为，表现为部分公司将分支机构从生产成本上升的地区迁往更低成本的地区（例如部分跨国公司将原设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迁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将西北欧的生产基地迁往东欧）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中资源寻求型 FDI 比例的持续提高（例如中国中石油、中石化等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联合国调研报告指出，低成本的劳动力不再是仅有的吸引 FDI 的因素了，快速增长的市场和具有充沛的技术型人力资源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因此，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FDI 不会再仅仅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将会越来越多。

全球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出现，这挤压了制造加工环节的利润空间，许多制造业公司通过向价值链两端不断延伸，提高其在生产基地的服务能力，这样既系统化整合了公司资源，也提升了其整体盈利能力。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纷纷加快调整战略，将竞争重点从产品制造转向客户服务，以提高营利能力。制造与服务的相互渗透融合进一步加强，有些传统的制造业公司甚至放弃或者外包了制造活动（例如 IBM、通用电气等），转化成某种意义上的服务公司。有学者用核心公司的“虚拟化”倾向来表述这一特征，即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包括生产制造和很多支持性活动）在核心公司之外完成，但是核心公司掌握着销售渠道、市场标准、链条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以保持竞争优势。

本土化一直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之一，这种系统化的投资战略可以全面提升公司进入本地市场的能力。金融危机加快了公司的本土化步伐，跨国公司从生产制造本土化向营销本土化、管理本土化和研发本土化深化，并逐步实现高级人力资源本土化。与危机前相比，跨国公司更为重视营销、管理、人事等经营要素融入和根植于当地文化的过程，通过持续加强在管理和研发环节的投资，进一步加强全球生产网络的地方镶嵌，以期在经济复苏过程中

提高其竞争能力。联合国报告指出,跨国公司的动态竞争使得价值链活动分散化,这种分散化的趋势由最初的制造加工环节向研发和设计环节延伸。跨国公司既获益于此种行为,又帮助了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起本土创新功能。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跨国公司必须有意识地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和创造知识,借助公司组织网络实现“全球学习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海外子公司已成为母公司重要的学习主体和知识创新源泉,跨国公司的网络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竞争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分支机构(特别是研发机构),将提高公司应对复杂市场的能力,以此提高其竞争力。研发机构的国际化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直接投资的明显特点,作为获取海外知识和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研发机构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并要求起到创造性作用。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国家或城市的人力资源、知识技术水平显得尤为重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美国商会对全球多家跨国公司的调研报告显示,跨国公司选择投资中国,除了因其庞大的市场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外,优良的人力资源和可获得的技术也至关重要。

(四)金融危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化浪潮背后的驱动力(如开放市场、全国供应链、全球一体化公司、私有制)正在削弱,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再度进入“强政府干预时代”,那些无根的公司正在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方面,私有制经济制度受到了影响,公共部门对于私人部门的参与度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危机给全球一体化公司带来了挑战,许多公司为了获得公共资金的支持,转变为国家公司。

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国际上各国政府的政策行为。政府应对危机的做法使得经济和金融走向分裂,本国偏向正在形成。政府一般倾向于支持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本国公司,鼓励银行的本地贷款,并鼓励消费者消费本国产品。许多国家采取了提高关税的行为,这对未来国际贸易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发达国家有强烈的扩大出口的需求,中国有强烈的扩大内需的需求。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为一些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参与变革的机遇。危机过后,各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出现重新洗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可能出现新的变数。

联合国报告指出,过去政府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角色值得反思,积极干预经济的政府角色是适当的。同时,如何保持发展和公平的平衡也值得关注。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图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持就业率。在产业政策方面,强调再工业化也成为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挽救经济的共同手段。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但是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成事实,欧债危机等新的经济问

题不断产生，世界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全球劳动分工理论

全球劳动分工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源泉。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认为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形成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而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则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生产网络主导的产品内分工，这一过程逐渐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扩展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国家。

（一）全球劳动分工理论的视角

全球劳动分工理论包括两个主要视角：一种是从地域生产要素分布或多因素组合的角度来看待劳动分工，以斯密、李嘉图、俄林、波特等学者为代表；另一种则从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来看待劳动分工，以 D. Massey、A. J. Scott、P. Dicken 等学者为代表。

（1）基于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组合的视角

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并由海克斯、俄林等学者进一步发扬，他们认为假设各国在技术相等的情形下生产方式会决定于土地、劳动力、天然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波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这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要素、产业配套、公司战略等多种因素的组合。他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特点和竞争优势，并揭示了 20 世纪 60—90 年代国际劳动分工格局形成的原因。竞争优势理论既包含了传统比较优势的因素（例如资源禀赋），也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的因素（例如公司战略和制度创新等），从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目前该视角研究的代表性理论。

（2）基于生产活动空间组织的视角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以 D. Massey、A. J. Scott 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劳动分工。A. J. Scott 将劳动空间分工同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联系起来，并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劳动分工的空间分析，赋予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分解以空间概念。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P. Dicken 和 P. E. Lloyd（1990）提出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内涵：一些区位处于控制核心地位，一些则处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以资本功能为特征的区域获得控制权，劳动力过剩的区域则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一理论框架强调了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将生产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

社会过程、政治政策、技术变革和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认为空间形态是社会过程的空间表现,是社会过程、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诸多社会经济现象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在以劳动分工为元理论的研究体系下,管理学、产业组织学及经济地理学等多门学科开始将其拓展为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等研究体系。由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本研究的核心内容最为相关,因此接下来进行详述。

(二) 全球价值链理论

(1) 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概念。1985年,波特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引入了价值链的概念:“每个公司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同一年,B. Kogut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中用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反映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1994年,G. Gereffi和M. Korzeniewicz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方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分析法。P. Krugman(1995)通过价值链条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分析,探讨了公司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强调了伴随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正以全球价值链的新形式重新进行空间分配。2001年,G. Gereffi在《价值链的价值》(The Value of Value Chain)中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进程,认为应该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看成治理体系,价值链的形成是公司不断参与到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的过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年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竞争》(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中为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定义,即不仅由大量互补的公司组成,而且是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的公司网络的组织集,关注的焦点不只是公司,也关注契约关系和不断变化的联结方式。“微笑曲线”形象地描述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位于曲线两端的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环节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处于价值链的高端;位于曲线中间部位的装配制造则具有较低的附加值,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前者也被称为“强势资本”,后者则被称作“弱势资本”或者“贫困资本”。

(2)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

①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

G. Gereffi(1999)提出,全球价值链是在全球商品链基础上实现商品或

服务价值的生产、销售乃至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全球化公司网络。他根据驱动力来源将全球价值链分为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前者以生产领域的产业资本作为动力,其主体是由掌握重要技术的发达国家跨国制造商为代表的關鍵性生产厂商,通过投资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纵向分工体系,并行使对不同环节的协调作用,其核心竞争力是研发和生产能力,产品主要集中在耐用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后者则以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作为动力,以国际品牌制造商、国际零售商为代表的购买者通过全球采购或贴牌生产、自主设计生产等方式组织国际商品流通网络,其关键性治理作用由一个或多个处于链条顶端的购买者实施,其核心竞争力是营销,产品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有许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兼具两种驱动力的特征。

在快速全球化的进程中,公司面临来自全球公司的竞争,无法完全依靠本国资源实现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来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J. H. Dunning (1998) 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机概括为四种:资源寻求型(resource-seeking)、市场寻求型(market-seeking)、效率寻求型(efficiency-seeking)和战略资产寻求型(strategic-assets-seeking),并比较了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址的影响因子变化。其中,影响资源寻求型投资的因素从资源价格、减免税政策拓展为相关产品加工和出口、当地合作等内容;影响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因素从工资、原材料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壁垒等拓展为容量大且增长迅速的区域市场、技术和人才的可获得性、相关公司的存在、区域基础设施质量、空间集聚型经济、政府政策、地方服务、邻近客户等内容;影响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因素从劳动力、原材料、设备成本、税收政策等拓展为对知识密集型和一体化行为的关注(例如研发职能)、人力资源培训、空间集群、公司间良好的合作关系等内容;影响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的因素从以合理价格获得所有权优势的相关知识资产和市场、影响该资源的制度拓展为公司获取分散的战略资源、与地方无形资产的互动和学习、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和偏好等内容。这一比较分析是国际投资领域的代表性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②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J. Humphrey 与 H. Schmitz (2001) 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定义为:通过价值链中公司之间的关系安排和制度机制,实现价值链内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非市场化协调。它能保证价值链上各环节间的交互式作用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某种组织性。G. Gereffi (2005) 根据主导公司与供应商